

中东政治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的关系演化*

余 泳 胡亦然

摘 要：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虽同为当代土耳其重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但前者以国家为导向，后者以社会为依托，且在不同时期对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后，因受到面临世俗精英势力的挑战、“居伦运动”与政府交好的先例，以及两者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和“宗教—社会”观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同“居伦运动”“结盟”的政治策略。但受两者政治合作空间锐减和“居伦运动”屡次“越界”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失衡、正义与发展党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双方在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对实行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居伦运动”；伊斯兰民主；埃尔多安

作者简介：余泳，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83）；胡亦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5级硕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6-0090-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上海外国语大学规划基金项目（KX171317）和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成果，同时受到2015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研究”的资助。

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欲推翻由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领导的土耳其现政府。7月16日上午,土政府对外宣称政变已被挫败,未遂政变造成265人死亡和1,440人受伤。事件平息数日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宣称,流亡美国的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①是此次未遂政变的主谋,理由是被捕的政变参与者中存在大量“居伦运动”的支持者。^②对此,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居伦立即发表声明,强调与此事件无关。土耳其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之间的矛盾早已公开化,而且不断升级。但在2008年前,正发党为对抗土耳其军方势力,曾选择同居伦结盟,对外示以亲密盟友的形象。但此后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之间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亲密到决裂的过程。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土耳其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化来探究促成正发党与“居伦运动”密切合作及其走向决裂的原因。

一、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的发展历程

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是中东地区高度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国内社会开放,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长期具有西方化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凯末尔主义现代化、西方化与世俗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伊斯兰教因素暂时被迫离开了国家政治、法律与科学教育等领域,但它作为广大民众的基本信仰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③随着二战后土耳其政府宗教政策的逐渐放宽,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因素重新焕发活力,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多党民主政治体制逐渐成型,伊斯兰教率先在教育、传媒和知识界等文化领域开启了复兴运动。冷战的终结使得宗教迅速替代了土耳其持续不断的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持续冲击,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需求进一步扩大。^④1996年,宗教色彩浓厚的土耳其繁荣党(Welfare Party)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自此,政治伊斯兰力量正式登上土耳其政治的中心舞台。简而言之,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发端于二战后,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影响持续至今。正发党与“居伦运动”则是这场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股力量。

土耳其正发党的缘起与政治伊斯兰运动密切相关。2001年,奉行政治伊斯兰思想的土耳其美德党(Virtue Party)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主流的政治伊斯兰

^① 又译作法图拉·葛兰或费图拉·居兰。本文除引文及引文文献外,统一称居伦。

^② 《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主谋被逮捕》,央视网,2016年7月18日 <http://tv.cctv.com/2016/07/18/VIDE08AR08YHdQooCp5s7Tpd160718.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9日。

^③ 丁俊:《葛兰运动——当代土耳其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宗教与民族》2014年第9辑,第335页。

^④ 郭蒙蒙:《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嬗变及其特殊性》,载《长沙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81页。

力量开始走向分化,原美德党改革派核心成员埃尔多安、居尔(Abdullah Gül)等人顺势创建正发党。为避免重蹈美德党覆辙,正发党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努力淡化本党的宗教色彩,奉行“保守民主”^①理念——即主张国家的社会性、宪政性与有限性的国家观,强调政府合法性应源自人民主权的政府观,重视政治多元性、原则性、改革性、现实性及服务性的政治观,推崇多元的参与型民主和追求制度化的自由民主观,尊重社会多样性与异质性和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社会观,以及注重经济发展并强调土耳其经济世界性、市场性及社会正义性的经济管理。^②在 2002 年土耳其大选期间,得益于其宗教背景与广泛的群众基础、亲民惠民的政治形象、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执政路线,正发党异军突起,最终赢得了大选,此后执政至今,是当下土耳其政坛最核心的政治力量。

“居伦运动”在土耳其国内也被称为“志愿服务运动”(Hizmet Hareketi),脱胎于主张公民伊斯兰(Civil Islam)的“努尔库运动”,创立者为伊斯兰思想家、教育家、苏菲派导师费图拉·居伦。1941 年,居伦出生于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省(Erzurum)的一个宗教家庭。居伦早年深受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的宗教思想影响,努尔西强调伊斯兰教的和平中正、宽容仁爱,坚信作为土耳其社会文化传统的伊斯兰教可与现代社会相融共生。^③居伦以倡导“信仰对话”而闻名于世,他认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倡导宗教宽容与众生平等的思想;追求世界和平,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提倡整合传统伊斯兰教与现代文明的“中间主义道路”;主张对青年的教育内容不应囿于科学知识,更应包含宗教知识的感化;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凸显土耳其民族性,反对跨国建立作为政治实体的“乌玛”(伊斯兰宗教共同体)。^④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居伦在招贤纳士的同时,积极创办属于自己的宗教社团。进入 90 年代以来,“居伦运动”将其教育产业拓展至海外,如在中亚诸国频设“居伦之家”。不久,势力大增的“居伦运动”引起了土耳其国内世俗派的警觉,1998 年居伦被土耳其法院指控为“通过伪装的民主及温和的假象颠覆世俗制度”^⑤。居伦在出庭受审前以身体原因离境赴美就医,从此定居美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居伦运动”旗下的国际学校不仅遍布全球 160 多个国家,更是建立了《时代报》、银河电视台等媒体机构和阿斯亚银行等金融产业,并在政府部门内部发展了大批支持者。外界普遍认为,居伦真正的影响力来自土耳其政府内部的“居伦运动”追随者,

① “保守民主”理念拥有以下两大基本点:第一,赞同有限的、界定清晰的政治权力形式;第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源自人民主权与法治,而最终基础是合宪性和普遍接受的规范。此外,该理念还强调,保守绝非反对变革与进步,而是不失本性的前提下适应变化。转引自朱传忠:《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4 年,第 76 页。

② 同上,第 78-80 页。

③ 丁俊:《葛兰运动——当代土耳其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第 333 页。

④ Kerem Öktem, *Turkey since 1989: Angry Nation*, London: Zed Books, 2011, p. 128.

⑤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恩怨纠葛》,载《世界知识》2016 年第 8 期,第 42 页。

相传其在警察、情报、反恐、检察等系统中均拥有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和响应者。^①

二、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结盟

德国著名伊玛目哈坎·亚伍兹(Hakan Yavuz)曾将伊斯兰运动分为国家导向型及社会导向型两大类,并认为前者以政党或与政党结盟的形式参与政治进程,后者则利用市场、媒体及网络等领域来影响社会与民众间的关系。^② 据此观点,土耳其正发党属于国家导向型的伊斯兰运动,“居伦运动”属于社会导向型的伊斯兰运动。具体而言,正发党不以反现行体制的“政治伊斯兰”自居,转而强调其作为普通政党的“保守民主”特征。“居伦运动”则属现代公民社会范畴,在与国家政权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运用教育、传媒及金融等手段实践自身诉求和拓展影响力。拥有执政地位的正发党同在民间兴起的“居伦运动”进行“结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21世纪初土耳其政治格局的发展促进了两者“结盟”。在2002年土耳其大选中,正发党获得了34.28%的选票,共赢得363个议会席位,成为土耳其多党制实施以来首个独立组建政府的政党。与此同时,代表世俗精英的共和人民党获得19.38%的选票、178个议会席位,^③成为最大的反对党。而土耳其军方势力作为世俗制度的捍卫者此时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和权威,保持着1997年“软政变”^④后树立的政治威信。因此,正发党在执政初期无法立即摆脱世俗精英势力的猜忌、掣肘与政治压制。“居伦运动”虽在“软政变”初期试图以“温和的伊斯兰运动”形象博取军方好感。^⑤但事实表明这一努力是失败的,军方甚至煽动旗下媒体对“居伦运动”加大负面报道来进一步清洗国家内部的“居伦运动”成员。在此期间,面对世俗精英势力的威胁,正发党欲借“居伦运动”的社会性优势稳定执政之基,“居伦运动”也期望依靠正发党的执政党身份寻求保护伞,两者选择结盟有利于双方共同摆脱军方势力的钳制。

第二,“居伦运动”素有与土耳其政府、国家领导层和政治精英交好的传统。与其他社会运动不同,“居伦运动”在积极经营教育、媒体等领域的同时,还通过接触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等官方力量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居伦本人也十分善于审时度势,

①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43页。

② 李智育:《正发党执政期间民主巩固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47页。

③ Ali Carkoglu, “Turkey’s November 2002 Elections: A New Beginning?”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 No. 4, 2002, p. 30.

④ “软政变”是指1997年的土耳其政变。1997年2月,面对国内部分政治势力的宗教狂热,土耳其军方出动20辆坦克、15辆装甲车,在事先聚集的大量电视台摄影记者面前展示了军队捍卫政教分离原则的决心。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宗教色彩浓厚的总理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最后被迫于当年6月18日辞去总理职务。1998年1月,执政党繁荣党被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

⑤ 咎涛:《居兰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党政论坛》2009年第9期,第30页。

重视寻求权力部门的庇护。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也希望通过主张温和伊斯兰思想的“居伦运动”去抵御苏联共产主义思潮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对土耳其的渗透。20 世纪 60 年代末,居伦利用土耳其当局宽松的宗教政策,开始涉足教育、媒体等社会公共领域。80 年代中期,居伦利用军管结束后土耳其国内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积极创办培养“黄金一代”的“阳光之家”。^①厄扎尔(Turgut Özal)时期,居伦公开响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厄扎尔政府因此劝说军方撤回禁止居伦公开布道的禁令。90 年代,“居伦运动”进一步向政府靠拢,如 1997 年为总统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和副总理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颁发所属基金会创设的“宽容奖”;以自身温和形象及对伊斯兰教的新阐释吸引更多群众,协助政府削弱繁荣党的群众基础与政治效应。^②作为回应,土耳其政府大力支持“居伦运动”在媒体领域的发展,助其创建报社、电视台及广播公司等媒体机构。

第三,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及“宗教—社会”观夯实了双方的合作基础。

首先,正发党与“居伦运动”都倡导社会多元和通过渐进式改良实现发展的政治主张。正发党不仅承认社会的异质与多样性,更将不同族群、宗教与党派视为财富之源,而非导致分裂的威胁。此外,正发党强调,极权与强制只会导致一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恶性发展,渐进转型才有助于社会变革的稳步推进。^③居伦思想的核心内容即“宗教对话”观则体现了对多元价值观的尊重,同时居伦排斥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思想,反对宗教政治化,强调穆斯林社会应通过自身改良实现现代化理念与传统价值观及身份认同的融合。

其次,正发党与“居伦运动”都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主兼容。正发党指出,权利、自由、平等、宽容等当代民主价值的核心理念不仅是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而且能与伊斯兰教义相兼容。同样,在居伦看来,民主、法治、人权、透明及问责等民主理念已在伊斯兰教义中得到体现,既能在《古兰经》中追根溯源,又不为伊斯兰教所独有,它们是不同的文明共享的智慧结晶。^④

最后,正发党的“宗教—社会”观促进了其在社会领域同“居伦运动”实现互补合作。正发党肯定伊斯兰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党内领导层大都承认伊斯兰教是民族纽

① “黄金一代”是指集科学知识 with 伊斯兰精神为一体的新兴人才,常与土耳其世俗教育所培养的“普通人才”(只注重科学知识)相对。

②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4 期,第 15 页。

③ 朱传忠:《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第 79 页。

④ Leman Sinem Topcuoglu, “The Conservative-Democracy: Identity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the Turkish Center-Right Traditio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December 2006, p. 100, <https://etd.lib.metu.edu.tr/upload/3/12608052/index.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2 月 8 日。

带、认同根源及合法性的主要渊源。^① 在论及宗教与政治关系时,正发党希望在社会领域保持自身与伊斯兰教的联系,但在政治纲领中则抛弃伊斯兰教。^② 换言之,正发党在强调个人宗教权利与自由的基础上,认可社会中个体的“宗教性”,但同时坚守国家整体的“世俗性”。作为社会导向的伊斯兰运动,“居伦运动”的理念有利于指导社会个体调和自身伊斯兰信仰与世俗国家间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践行正发党的“宗教—社会”观。

综上所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的格局为正发党与“居伦运动”开展合作提供了政治空间,两者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及“宗教—社会”观又为双方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合作奠定了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居伦运动”的鼎力支持下,正发党顺利赢得了2002年大选,之后双方仍存在相互利用的政治价值——执政初期的正发党尚无法完全取得土耳其国内世俗精英的信任,因此需要借助“居伦运动”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而“居伦运动”也需要依靠正发党的执政党地位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国内层面,“居伦运动”继续与正发党政府携手,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削弱军方势力。正发党当局以“申请入盟”为由,在“居伦运动”的暗中支持下,出台了一系列使军方权力受限的法规,比如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预算和弱化其行政职权,力图使其逐渐转变为普通的政治机构;严格审查军方的财政支出;肃清高等教育委员会中的军方势力。^③

正发党和“居伦运动”的结盟在2008年“正发党取缔事件”中达到了高潮。2008年3月14日,土耳其总检察长雅尔钦·卡亚(Yalın Kaya)以违反世俗主义为由起诉正发党,要求宪法法院判决正发党为非法政党。在宪法法院驳回上诉后不久,警察、司法系统内的“居伦运动”支持者立即发起了针对“埃尔盖内孔”(Ergenekon)^④组织的大规模报复性调查,并得出结论:近年来,“埃尔盖内孔”组织试图多次发起针对政要与正发党高层人士的暗杀,最终目的则为推翻正发党执政。^⑤ 此后数年,政府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不断以调查“未遂军事政变”为由,逮捕了大批土耳其军方人员、部分政客、记者及知识分子^⑥——被捕者大都曾猛烈抨击正发党或“居伦运动”。同时,正发党当局也着手调查军方的政变活动。2010年,正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前空军司令及前海军司令在内的48名高级军官,并提出修宪议案,意在通过改组宪法法院人员构成而限制军事法庭势力。同年,该议案获得通过,至此军方丧失了土耳其

①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2009, p. 159.

② 朱传忠:《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第84页。

③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43页。

④ “埃尔盖内孔”取名于阿尔泰山脉中一人迹罕至的秘密山谷。据说,该组织为土耳其地下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常常私下策划针对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阴谋,通常被认为与土耳其军方及安全部队联系密切。

⑤ M. 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 The Gülen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13.

⑥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第16页。

其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2012 年,正发党当局再次以“涉嫌发动政变”为由,将 300 名土耳其现役军官投入监狱。

在外交层面,“居伦运动”积极对外拓展影响力,一时间成为正发党政府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伦运动”于境外创设的“阳光之家”逐渐以教育质量而闻名当地,不少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亦就读其中;“居伦运动”主办的报纸《时代报》不仅在土耳其境内销量不俗,其畅销海外的英文版更成为对外展示土耳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居伦运动”旗下的记者与作家基金会已能汇集各方有识之士、宗教领袖及政客商人,共议全球热点问题。^①此外,“居伦运动”在国外开办了土耳其文化中心,旨在改善和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形象。

三、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关系的恶化

在正发党执政前期,通过与“居伦运动”结盟,有效削弱了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精英势力,稳固了自身执政地位与合法性。而“居伦运动”也在正发党的默许下,向警察、司法、情报及教育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其亲信人才。一时间,“居伦运动”实力激增,逐渐成为正发党所谓的“平行机构”。随着世俗精英势力这一共同威胁的式微,双方在外交等领域的矛盾开始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两者关系恶化并走向决裂。

双方的公开分歧始于 2010 年 5 月的“马尔马拉号事件”。当年 5 月 31 日,以色列海军突袭试图驶入加沙沿海地带的土耳其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马维·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造成八名土耳其籍船员死亡。事件发生后,土以两国的外交关系顿趋紧张。在美国广受犹太团体资助的“居伦运动”不愿看到海外利益因土以两国交恶而受到影响,故对正发党当局强硬的对以立场颇有微词。居伦本人甚至指责马尔马拉号救援项目的主办方“人权、自由和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Humanitarian Relief)轻视以色列的“权威”(authorities),才导致了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②

2011 年 9 月,双方关系又因“库尔德独立门”而进一步蒙上阴影。当时,亲库尔德工人党的媒体爆料,国家情报署署长哈坎·菲丹(Hakan Fidan)受埃尔多安之托,以特使身份开展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新一轮会谈。外界普遍猜测当局是否存在与库尔德人交好、满足其独立诉求的倾向。随即菲丹与其助手收到了据称是“居伦运动”支持者的检察官的传唤,询问他们与库尔德工人党会谈的详细内容。此举无疑使正发党政

^① Helen Rose Ebaugh, *The Gülen Movemen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a Civil Movement Rooted in Moderate Isla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10, p. 22.

^② 参见 Mavi Marmara and Fethullah Gülen's Critics, *Ismail Mesut Sezgin*, <http://fgulen.com/en/home/1324-fgulen-com-english/press/columns/38038-ismail-mesut-sezgin-todays-zaman-mavi-marmara-and-fethullah-gulens-critics-politics-and-principles>,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25 日。

府倍感压力。不久,正发党政府也争锋相对地出台新法规,使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可免于被起诉,并解除了约 700 名参与此次调查的检察官及警官的职务。^①

2013 年 6 月的“加济公园抗议事件”通常被视为正发党与“居伦运动”关系正式决裂的开端。^② 该事件由最初伊斯坦布尔市民不满政府对加济公园的改造引发,逐渐升级为民众对正发党当局限制新闻、言论、集会自由且过度侵犯世俗主义的全国性示威抗议。事件发生期间,居伦公开批评正发党当局镇压抗议者,而埃尔多安则反唇相讥,指出正是“居伦运动”的暗中煽动与操控,才使得局面失控并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2013 年 11 月,正发党当局提交议案,以加强课程监管、保证教育公平为由,^③取缔全国的私立备考学校(Cram Schools)。正发党此举被解读为针对“居伦运动”,因为作为土耳其办学规模最大的私立备考学校,致力于培养“黄金一代”的“阳光之家”正是“居伦运动”重要的人才基地与收入来源。至 2012 年末,“居伦运动”旗下的私立备考学校数量已达 4,055 所,正式学员 120 余万人。^④ 议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居伦运动”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时代报》更是将该议案称作“教育界的最大阴谋”。^⑤ 然而 2014 年 2 月议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该议案。

2013 年 11 月 28 日,亲“居伦运动”的报刊《塔拉夫》(Taraf)主编梅赫梅特·巴兰苏(Mehmet Baransu)撰文称,正发党当局早在 2004 年 8 月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MGK)密谋清除政府机关中“居伦运动”势力的计划。“居伦运动”旗下的银河电视台同时披露,当局正与国家情报组织(MiT)合作,不断加强对土公民个人的日常监视。时任总理政治顾问的雅尔琴·埃克多安(Yalcin Akdogan)随即驳斥了上述媒体对正发党当局的指摘。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土耳其检方系统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以打击腐败为名,突然逮捕包括经济部长之子和内政部长之子在内的 80 余人,并对其中的 24 人提起正式起诉。12 月 25 日,内政、经济和环保部长被迫辞职,埃尔多安不得不举行紧急会议,仓促更换了近半数内阁成员。^⑥ 2014 年 1 月,土耳其司法系统中的“居伦运

①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 43 页。

② 《“居伦运动”视域下的“加济公园抗议事件”》(土耳其文),新闻时刻网(土耳其文),2013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haberturk.com/gundem/haber/850438-fethullah-gulenden-gezi-parki-aciklamasi>, 登录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

③ “Turkey Passes Law to Shut Down Cram Schools,” *Daily News*, March 2, 2014,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ey-passes-law-to-shut-down-cram-schools.aspx?pageID=238&nid=63082>,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24 日。

④ Fabio Vicini, “The Irrepressible Charm of the State: Dershane Closures and the Domestic War for Power in Turkey,” *Jadaliyya*, March 24, 2014.

⑤ [土耳其]埃克雷姆·杜马里:《被取缔的补习学校》(土耳其文),《时代报》网站,2013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zaman.com.tr/ekrem-dumanli/dershaneler-kapanir-ama-kapatilamaz_2168670.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3 月 9 日。

⑥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第 43 页。

动”支持者再次针对正发党发起挑战。新年伊始, 检察官阿齐兹·塔克茨(Aziz Takçi)突然提出, 应立即叫停并搜查国家情报组织派至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救援车, 暗指救援车中有正发党当局与“伊斯兰国”组织勾结的证据。^① 2月25日, 疑似埃尔多安叮嘱其子转移财产的视频悄然传播于网络。反腐调查事件对埃尔多安的形象造成了重大打击, 激化了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矛盾。

对此, 埃尔多安政府随即展开有力反击。第一, 正发党公开宣扬“平行机构”对国家政治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 宣布将彻查 2013 年 12 月 17 日的“反贪腐行动”, 并有意将关乎“平行机构”规模的情报公之于众。据评估, “平行机构”已渗透至土耳其全国 27 省, 涉及 2,000 余名警察、检察、法院系统成员及部分记者、学者与企业家。^② 第二, 在全国范围内警察及检察、法院系统中的公务员进行调岗, 波及人员多达 1,500 余人。^③ 第三, 土耳其当局出台新法规, 授权内阁可就反恐、国家安全等问题直接调遣国家情报组织, 允许国家情报组织在紧急时刻忽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以便直接获取最有效的信息。^④ 第四, 出台更为严格、保守的网络审查法, 甚至在 2014 年地方选举前一周封锁国内 YouTube 与“推特”(Twitter) 等社交媒体的使用。第五, 陆续宽赦 2008 年以来逮捕的“埃尔盖内孔”组织成员, 拉拢残存的军方势力共抗“平行机构”。

2015 年为议会选举之年, 虽然历经了上述风波和两次大选, 正发党仍以 49.4% 的高得票率赢得了继续单独执政四年的机会。连任后, 正发党当局加大对警察、检察、法院及安全系统中“居伦运动”势力的整肃, 约 6,000 名警官因疑似“居伦运动”成员或支持者而遭到解职;^⑤ 利用亲政府媒体强化“居伦运动”“平行机构”的负面形象, 逮捕具有“居伦运动”背景的专栏作家; 通过立法手段认定“居伦运动”为恐怖组织, 敦促美国立刻引渡居伦本人回国; 打压“居伦运动”所属机构(如《时代报》), 甚至不惜与抗议者发生激烈冲突。2016 年 7 月未遂政变发生后, 正发党当局正式取缔了《时代报》、银河电视台等残存的“居伦运动”媒体。至此, 正发党与“居伦运动”正式决裂。

四、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走向决裂的原因

土耳其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从结盟走向决裂的过程既源于双方在政治、经济与

① 《MiT 调查报告出炉》(土耳其文), 邮件网, 2015 年 5 月 29 日, <http://www.posta.com.tr/mit-tirlari-mansetine-sorusturma-haberi-284217>, 登录时间: 2017 年 7 月 9 日。

② 《总理解雇疑似“平行机构”人员 2000 余名》(土耳其文), “NTV”网, 2014 年 1 月 1 日, <http://www.ntvmsnbc.com/id/25489229/>, 登录时间: 2017 年 10 月 10 日。

③ [土耳其]埃夫坎·阿拉:《论安全与司法部门的裁员》(土耳其文), 警察新闻网, 2014 年 2 月 22 日, http://www.polishaber.net/efkan_ala_emniyette_gorevden_alma_olmadi-12079h.htm, 登录时间: 2017 年 7 月 26 日。

④ “Draft Law Would Drastically Expand Turkish MIT's Powers,” *Al-Monitor*, February 21, 201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security/2014/02/turkey-draft-law-intelligence-sweeping-powers.html>, 登录时间: 2017 年 7 月 26 日。

⑤ 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 第 43 页。

外交等领域的不同政见,也同双方政治合作空间的锐减、“居伦运动”“越界”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失衡、正发党战略目标调整等深层原因密切相关。

首先,正发党和“居伦运动”在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上存在巨大分歧。“居伦运动”支持者大都反对埃尔多安而支持相对“温和”的时任总统居尔。2011年大选后,土耳其《时代报》开始含沙射影地指责埃尔多安自恋、骄傲,且不愿听从身边人的意见,并警告埃尔多安自负的后果。^①事实上,在“居伦运动”支持者看来,居尔才是下一届政府总理的不二人选。2013年6月“加济公园抗议事件”期间,居尔违背埃尔多安意愿,多次向示威者示意同政府和解,“居伦运动”的媒体则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居尔的支持。面对曾经的盟友“居伦运动”同正发党内部竞争势力结成新盟友,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人士无法容忍既得政治利益被分化或转移,双方的矛盾不断恶化。

其次,正发党和“居伦运动”在民族政策取向上的分歧日益凸显。“居伦运动”欲借对国内政治进程的参与扩大自身势力,有时不惜与正发党当局持相反的政见。例如,双方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分歧严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且事关国家统一。正发党内部大都支持埃尔多安提出的“库尔德新思维”,认可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但“居伦运动”支持者们却认为,既然自身势力遍布国家公职系统,那么战争等紧急状态无疑有助于其在乱局中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居伦本人也曾暗示政府,希望对库尔德工人党持强硬措施,孤立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逮捕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异见人士。^②2011年9月,土耳其媒体将2009年正发党政府与奥贾兰间的秘密协议——“奥斯陆和平对话”公之于众。显然,“居伦运动”被刻意排除在签订该秘密协议的进程中。居伦本人对此更是大为不满,宣称在解决库尔德问题方面,“居伦运动”分明先于正发党而采取措施,“但如今成果却被正发党窃取”。^③

再次,正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导致“居伦运动”的经济收益蒙受损失。正发党上台伊始,沿用厄扎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增加外资收入,严控通货膨胀。正发党执政十年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财政赤字降低了三分之二,GDP增长了三倍。但自2009年起,正发党政府逐渐调整经济政策,通过出台资产管理法,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等手段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监管。^④至此,亲正发党的企业从公共采购及基础设施建设中逐渐获益增多,重大经济项目合同也大都签给

①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第18页。

② 同上。

③ “Galip Dalay: The Kurdish Peace Process in the Shadow of Turkey’s Power Struggle and the Upcoming Local Elections,”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March 25, 2014, <http://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4/03/2014324115034955220.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0日。

④ Sarah El-Kazaz, “The AKP and the Gülen: The End of a Historic Alliance,” *Crown Centre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No. 94, July 2015, p. 6.

了追随埃尔多安的公司。^① 2011 年后, 商贸领域官商勾结和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与“居伦运动”交好的企业渐感自身地位不断边缘化并日益不满, 进一步激化了“居伦运动”与正发党间的矛盾。

最后, 正发党和“居伦运动”相背离的对外政策取向导致两者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正发党执政后, 其外交理念大致秉承达武特奥卢 (Ahmet Davutoğlu) 提出的“战略纵深主义”, 推行“零问题”外交政策, 即在巩固欧美传统盟友的同时, 积极“向东看”, 打破自冷战时期形成的地区孤立。但纵观正发党前两届任期内的外交实践, 其对外政策取向的重心实为加入欧盟, 对内亦以“欧洲标准”大力推行改革。^② 然而, 随着 2006 年以来入盟谈判停滞, 2010 年“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 备受地缘政治压力的正发党当局开始大力参与周边地区事务。^③ 此举显然与亲欧美、不愿过多卷入地区争端的“居伦运动”相左。

综上所述, 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矛盾的症结在于各自对有限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源的争夺, 导致双方政治合作空间锐减。2002 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后, “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逐渐成为土耳其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与社会思潮, 军方世俗势力虽受到打压但仍有复兴的可能。此时作为伊斯兰运动一体两面的正发党与“居伦运动”, 不仅拥有共同的世俗派敌人, 更有相似的政治理念以及可调动的社会资源, 尚有充足的政治空间可供双方合作或“结盟”。但当 2007 年正发党再次执政及 2008 年土耳其军事法庭被迫改组、军方势力彻底式微之后, 双方的共同威胁已经消失, 既没有更多政治权力需争取, 也不存在足够的可分配的社会资源。独霸土耳其政界的正发党试图通过拓展权力范围逐渐控制教育、文化等“居伦运动”的“传统阵地”; 而“居伦运动”也不断巩固其在土耳其司法、警察与官僚系统中的势力, 在形成所谓“国中之国”和“平行机构”的同时, 设法在国内传统政治议程中获得更高地位和更大话语权。在政治合作空间锐减的背景下, 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的决裂在所难免。

更为严重的是, “居伦运动”的种种“越界”行为触及了正发党作为执政党的敏感神经, “居伦运动”多次针锋相对地挑战政府权威, 加重了正发党对它的猜忌与打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领域中的核心问题, 而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关系不仅是公民社会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 更极大地影响着民主化能否顺利地进行。^④ “居伦运动”并非政党, 却在“库尔德独立门”、“加济公园抗议”等事件中或明或暗地表达

①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第 18 页。

② Kerem Öktem, *Turkey since 1989: Angry Nation*, London: Zed Books, 2011, p. 134.

③ 苏闻宇:《从“战略纵深”看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转变——兼谈土耳其的国际身份定位》,载《国际论坛》2013 年第 6 期,第 68 页。

④ 庞金友:《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一种可能性的分析》,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9 期,第 36 页。

其政治诉求,展现了其在国内外政治进程中意欲获得更多发言权与决策权的企图。在此背景下,作为公民社会范畴的“居伦运动”想进入政党主导的现实政治世界,必将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失衡。

最后,正发党长期的战略目标无法容忍“居伦运动”作为“平行机构”而存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深知,“战略纵深主义”的贯彻和土耳其“中心国家”地位的确立,都离不开一支本土化、不受欧美外部势力左右的新精英队伍。^①而纵观历史,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有操纵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惯例,库尔德问题便是明显一例。^②而居伦本人自90年代末开始便已移居美国,其势力的发展壮大亦同美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正发党而言,统治合法性的稳固、执政理念的有效实施,都须建立在清除欧美代言人影响的基础上。因此,与西方势力关系密切的“居伦运动”因而成为正发党当局落实“独立自主”战略的最大绊脚石。

五、结语

土耳其正发党执政伊始便以“保守民主党”自居,追求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民主。在政治层面,该党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改善人权和发展公民社会,提倡精英民主和“多数决定制”。^③尽管居伦本人一再声称“居伦运动”与政治无关,但该运动仍向外界清晰表达了它的政治观点,即积极倡导自由民主原则,探索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中间道路”,追求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民族安全认同。^④应该说,双方基于各自利益与视角对民主政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认可自由、平等、包容、有效参与、充分表达等民主政治最为基本的内涵与价值。

然而,纵观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双方携手压制土耳其世俗军方势力,抑或是反目对抗,其过程都伴随着“卡夫卡式的困境”——即充斥着超现实的阴谋与卑鄙伎俩。^⑤“图尔坎·萨伊兰事件”^⑥曝光后,当时越来越多的土耳其警察、检察系统中大批“居伦运动”支持者捏造证据和秘密证人以及花样百出的调查手段渐渐浮出水面。有分析指出,2007年以来,土耳其警察和检察系统的“花架子”公审可谓漏洞百出,荒谬之处数不胜数。在某一案件中,警方在搜查一基督教徒嫌

① 郭长刚:《土耳其修宪公投背后的政治追求》,载《文汇报》2017年4月17日,第4版。

②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伦运动的发展》,第18页。

③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第23页。

④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载《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9页。

⑤ [美]丹尼·罗德里克:《葛兰运动在土耳其》,第87页。

⑥ 图尔坎·萨伊兰(Türkan Saylan)是土耳其最早的皮肤科女医生之一,也是“打败麻风病运动”的领袖,更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2009年在肃清“埃尔盖内孔”组织时,她被认为涉嫌政变而得到调查。但当美国专家对萨伊兰的工作电脑硬盘进行图像取证后,意外地发现犯罪档案进入硬盘的时间竟晚于这台电脑在萨伊兰基金会的最后一次使用时期——所谓的犯罪证据极有可能是人为捏造的。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葛兰运动在土耳其》,第86页。

疑人的住所前“搜获”了该嫌疑人密谋起义的文件;而另一案件中,警方“发现”了他们所寻找的证据,尽管他们前往突击搜查的地址根本是错误的。以上案件无一得到平反,有些冤案更据信是得到埃尔多安本人的默许与庇护。^①

2012 年,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矛盾逐渐公开化,除了公开合法的示威游行与立法斗争外,双方的“斗法”手段亦充满着诡计与原始的政治报复。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不断在正发党总部、土耳其总理与总统办公处安置窃听与偷拍装置,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正发党官员受贿证据,并以各种渠道公之于众。而正发党政府则还之以“贴标签”:先将无法证明“埃尔多安与其子”视频是伪造的技术人员列为“居伦运动”“同情者”,将其悉数停职,^②后凭其行政与人事权力大肆劝退警察、检察、法院系统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近年来正发党注重舆论宣传,常向受众灌输“逢坏事必与‘居伦运动’相关”的观念。比如对于 2016 岁末发生的俄罗斯大使遇刺案,土耳其主流媒体大都着重报道刺杀者是“居伦运动”“阳光之家”的学员身份。

诚然,无论是正发党与“居伦运动”联手对军方世俗力量的打压,还是矛盾频现后相互的“密切监督”,客观上发挥过一定的社会制衡作用。然而,双方关系的“聚”与“离”在于二者政治合作空间的充足与否——双方的“聚”无法体现民主政治应有的精诚合作,双方的“离”亦无法被视为民主政治应有的监督与制衡,有的只是对自身政治空间扩大与巩固的欲望,且双方关系一味恶化无法体现民主政体应有的政治分歧处理机制,只能加剧“国家—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居伦运动”当前已被正发党政府定性为“居伦恐怖组织”,其在土耳其国内的势力被大幅削弱。同时,正发党政府通过数次连任,其稳定的执政党地位基本确立。2017 年 4 月 16 日,土耳其修宪法案以 51.37% 的微弱优势通过,土耳其的政权组织形式由原先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此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理一职将被撤销,总统转而被赋予了组阁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及相应的各项行政权力;议会权力遭到极大削弱与限制,几乎无力再制约总统;宪法法院亦将被重新设置,其独立性大减。^③ 客观地说,土耳其执政精英的集权倾向正日益严重,反对派力量基本起不到有效制衡作用。未来土耳其“伊斯兰民主”之路依旧充满未知与变数。

(责任编辑:章 远)

① 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葛兰运动在土耳其》,第 88 页。

② [土耳其]法蒂赫·贾木尔:《从国家科技委员会的视频报告谈起》(土耳其文),激进网,2014 年 2 月 22 日, <http://www.radikal.com.tr/turkiye/ses-kaydinin-faturasi-tubitaka-cikti-1178686/>, 登录时间:2017 年 9 月 7 日。

③ 储殷:《后政变时代的政变:埃尔多安“复制”戴高乐》,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9 期,第 75 页。